



社会稳定研究论丛
SHEHUI WENDING YANJIU LUNCONG

肖唐镖 主编

农民抗争经典著作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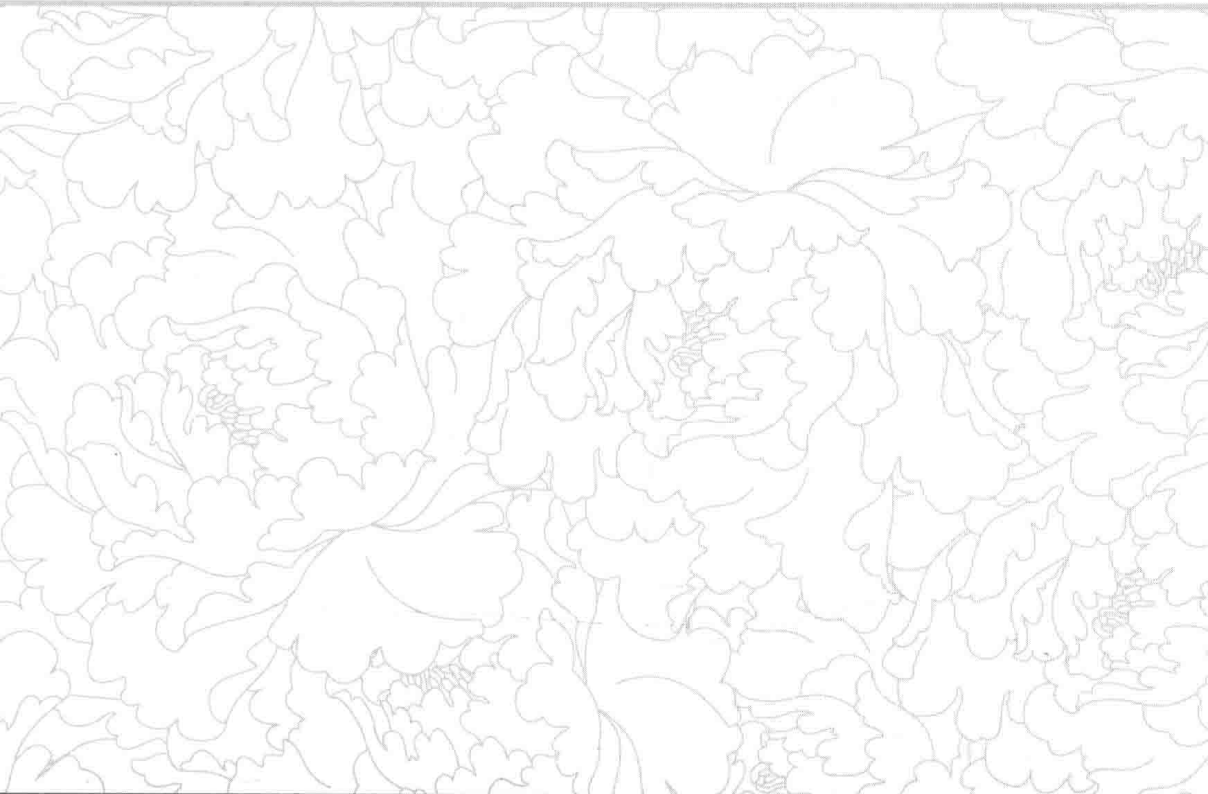
肖唐镖 刘 莉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稳定研究论丛
SHEHUI WENDING YANJIU LUNCONG

肖唐镖 主编



农民抗争经典著作评述

肖唐镖 刘 莉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抗争经典著作评述 / 肖唐镖, 刘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社会稳定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161 - 6597 - 3

I. ①农… II. ①肖… ②刘… III. ①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1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稳定研究论丛

学术委员会

蔡永顺	陈 峰	单光鼎	但彦铮
冯仕政	景跃进	李连江	刘 能
刘爱玉	刘明兴	罗兴佐	苏 阳
童 星	王晓毅	肖唐镖	徐 昕
杨国斌	应 星	于建嵘	张 静
张小劲	赵鼎新	赵树凯	

总 序

肖唐镖

国内学界对社会矛盾、纠纷与冲突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自乡村、继而到城镇以信访和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冲突日益频发，这一领域更吸引着日益增多的研究者的关注。然而，让人未免有点遗憾、但又不能不认同的是：对此貌似繁荣的研究景象，就如几年前赵鼎新教授所直率的评论，“国内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

近年来，为推动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与民众集体行动领域的科学研究，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主阵地，海内外众多学者联手，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牵头，先后举办了“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研究讲习班”（2007年）、“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工作坊”（2011年）；《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连续刊发多篇相关学术论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译林出版社等机构先后出版数十种国际学界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凡此种种，聚溪成河，已在改变着该领域的研究生态，包括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与范式、研究方法与工具、乃至表达话语与概念。籍以时日，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科学研究和理论进步，适宜国情且具前瞻性与进步性的政策研究，定将涌现。我辈没有理由不为之而欢喜！

幸逢其时，得到领职单位等机构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众多华裔学者的支持，我们也力图搭建相关平台，以襄盛举。一方面，举办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论坛），让学者们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对话和争论；另一方面，出版“社会稳定研究书系”，包括《社会稳定研究论丛》与《群体性事件

案例报告》两个系列。“案例报告”将采集国内的典型案例，既应教学、培训之需，更望其能成为人们了解、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研究论丛”既含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也有单独成篇的学术专著，以集中展示学界的相关研究。诚望得到众位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简 要

“农民抗争”仍然是一个充满论争的研究领域。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世界市场、现代化变迁、精英动员、组织化程度、政治过程与机会结构、剧目、认同、情感、理性，究竟什么是引发和促成农民抗争的因素，哪一个才是农民抗争的真实故事？学者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农民革命、抗争和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从将农民视为革命理念传播的接受者转变为关注农民自己的抗争历史；第二，解释框架从经典社会心理学理论发展为更为丰富的社会运动理论；第三，分析视角不再单独从社会或国家出发，而是关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传统虽然仍然被一部分研究者继承，但已进行了重大修正；斯科特的道义经济理论成为流行观点，常常被引用、讨论和重构；国家角色在分析框架中显然更具有独立性；农民抗争的政治意义以及它和民主进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成为崭新的政治理论来源。

本书的文章所评述的都是当代农民抗争事件、革命、运动研究的经典之作。从中我们可以勾勒一个研究领域的边界和传统，即核心问题、解释框架和重要论争，得以了解一种社会科学范式形成和更新的逻辑。

目 录

导论:农民抗争研究的学术史	(1)
查尔斯·蒂利《旺代》的评介	(34)
沃尔夫《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评介	(46)
《农业革命》学术述评	(67)
逃离国家和文明的再界定	
——评詹姆斯·C. 斯科特的《不被统治的艺术》	(88)
《日本德川时期农民的抗争和起义》研究述评	(112)
农民抗争的理性	
——波普金《理性的小农》书评	(130)
《农村的权力与抗争》研究述评	(150)
底层政治的“对话者”	
——对斯科特代表著作及思想的评述	(168)
民变与传统国家崩溃	
——对孔飞力一个经典议题的分析性叙述	(183)
《华南农村革命:海丰县的农民及其历史 形成(1570—1930)》述评	(197)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

——《中国农村的依法抗争》述评 (225)

《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述评 (248)

导论：农民抗争研究的学术史

— 引言

从农民抗争的视角阐释现代政治模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案。正如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所云“农村结构及其冲突是理解现代政治模式的关键”。^①事实上，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也确实从未间断。

对国际学界有关农民抗争领域的相关研究状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译介境外学界的不少研究作品。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境外学界的这一研究状况之引介与掌握并不系统、全面，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一直未有汉译作品，必要的学术述评也显不足，十分值得弥补。为此，近数年来，在肖唐镖所主持的研究生课程《乡村建设与治理研究》及其与刘莉共同主持的研究生课程《抗争政治研究》上，我们便向同学们推荐并分发了一批境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作品，提请大家细致而系统地阅读，并进行学术述评。述评系围绕作者及其作品而展开，其基本内容大体包括：作者生平及其学术简历；作品内容简介；作品的逻辑结构及内容详析；作品的研究方法、解释框架及其评议；比较分析与结论。收入本论文集的评述文章便来自这些课程，它们所评述的对象都是当代农村抗争事件、革命或运动研究的经典之作或重要人物。借助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勾勒有关农民抗争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核心问题、解释框架和重要论争，可以了解这一领域社会科学的范式形

^①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x xi页。

成与更新逻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农民革命、抗争和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发展出了诸多经典理论,并一直在展现新的变化。表现为:第一,从将农民视为革命理念传播的接受者到对农民自己的历史、社会结构、政治过程的关注;第二,解释框架从经典社会心理学到社会运动理论的转变;第三,从社会、国家各自不同的分析视角到关照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转变。其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传统虽仍然被一部分研究者继承,但显然已进行了重大修正;斯科特的道义经济理论成为流行观点,常常被引用、讨论和重构;而国家的角色在分析框架显得更具有独立性;农民抗争的政治意义以及它和民主进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成为崭新的政治理论来源。

“农民抗争”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研究领域。在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世界市场、现代化变迁、精英动员、组织化程度、政治过程、机会结构、剧目、认同、情感、理性等因素中,究竟哪些是引发或导致农民抗争的自变量,农民抗争的真实故事究竟如何?要想理清这些作品对这一核心理论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理清研究者对“农民抗争”这一概念的立场、观念和研究进路。这里,以后续各文的主要研究为基础,结合境外学界的相关研究,简要回顾农民抗争研究的学术史,以为本文集的引论。

二 农民与抗争

(一) 何为农民

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农民抗争这一主题的研究进路和解释框架。经典马克思理论关于农民革命的传统研究,往往在“农民—地主”这对概念中考察作为被剥削群体或阶级的农民。但显然,这种界定过于狭窄了。

米格代尔借鉴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界定农民的三个标准:(1)经济标准,指农民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货币和市场关系;(2)政治标准,指农民在相对集权的国家中处于从属地位,要服从那些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并把一部分收入交给这些阶级;(3)文化标准,指农民具有系统的批判性的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文化传统。并加上了一条可

以假定为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即:(4)土地和农业生产占其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①第一条经济标准与贫富无关,而是一种市场成员的界定,它使农民在经济地位上区别于农奴。第二条政治标准界定了农民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与有权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第三条文化标准则指出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小传统”。最后一条标准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最容易被观察、被认同的标准,土地和农业对于农民生存状况是决定性的。

这种对农民概念的界定相对笼统,在各自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描绘出农民的不同侧面。比如,在詹姆斯·斯科特眼里,农民的含义不止于此。即便在一个未经打扰的村庄中,东南亚农民的境遇也是悲惨的。他注意到“水深及颈”的生存状态,并强调村庄中以道义伦理为中心的庇护关系和社会秩序。斯科特描绘出的农民处于生存危机,同时深深扎根于道义文化传统之中。显然,波普金并不完全同意斯科特眼中的农民形象,特别是其道义形象,他看到的农民是和资本家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的经济理性人、政治资本家。这意味着,至少在经济关系上,农民并不具备独特的“小传统”,所观察到的独特,是具体空间下一个更为普遍的经济理性逻辑运行而产生的结果。

在农民学的研究传统中,三种经典假设一直具有重要影响^②:来自舒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也称为形式主义的研究路径,将农民视为经济市场上的企业家,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波普金的《理性的小农》^③就是这一进路的代表作品;来自恰亚诺夫和波拉尼的实体经济学,视传统农业社会为前现代的社会关系嵌入经济、政治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状态,这种研究进路往往能够迎合人类学家的研究志趣,斯科特的《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堪称经典;第三种进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农民的“受剥削的耕种者”角色。这三种对农民的界定,直接影响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研究结论,也同样为描绘农民抗争这一主题的画卷铺垫了不同的底色。

米格代尔提出了农民的标准,但农民究竟包括在农村中或以农业为中

①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

③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心的哪些人？他们对“农民”这一概念是否有足够的共识？三种农民学传统的争论，实际上也在于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民有不同的界定。沃尔夫在《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①中就特别强调富农、中农、贫农面对革命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强调农民和地主阶层的对立，农民以佃农、雇农为主。形式主义经济学则尤为关注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实体经济学则往往将自耕农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果以后面两种理论为标准，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主大有可能也是农民。蒂利在《17世纪法国的日常冲突与农民叛乱》^②一文中以土地占有为标准，区分了农民的类型，并强调对农民抗争的研究，必须摆脱马克思传统地将其局限于无地者对有地者的反抗，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将把大量的农民抗争行为和事件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17世纪的法国也就不存在农民叛乱——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农民的生活围绕土地展开，但抗争却并不总是与土地的控制有关。

那么，如果想展开农民抗争的研究，并使对话一直进行下去，我们对农民的定义必须能涵盖以各种身份、角色存在的农民。其实，纵观农民抗争领域的研究，也确实无法排除他们中的任何一种，如此才能认识清楚：在宏大的历史变革背景下，以农民为主体（而无论实际的操纵者、组织者和被反抗的对象是谁）的革命（revolution）、反叛（revolt）和抗争（contention）行动的原因、过程、结果和影响。

总之，在农民抗争研究中，“农民”这一身份包含了以下特征：

1. 生存环境。资本主义市场的兴起，在深刻影响农村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对于下层农民来说，看不到生活会变更好的希望；而对中上层来说，则提供了有机会改变现状的选择，尽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变。总之，传统社会受到挑战，农民首先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就是经济“危机”——危险和机会。

2. 行动者。新一代的农民学研究，在动摇了普遍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已经扬弃了文化决定论、文化传播论的观点，不同意将农民看作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或是完全被动的存在。相反，人们更愿意从行为主

① 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② Guggenheim E Scott & Robert P. Weller, eds., *Power and Protest in the Countryside: Studies of Rural Unrest in Asi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 C.: Dwy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义观点出发，从农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农民的行为选择出发，去发现农民这一身份群体的行为逻辑。因此，无论是否存在意图结果，农民都是社会行动者，受制于制度同时也是建构制度的行动者。

3. 独特的亚文化。农民不同于工人或者其他社会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的亚文化，一种熟人社会的共同体。在以耕作作为生活中心的世代承传中所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生存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是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一个极端情况是，比如像在“冲击—反应”理论传统中所暗示的那样，如果没有世界市场，如果没有现代国家建设，如果没有制度渗透和文化传播，这样的共同体会无穷再生产、复制下去，无论对于不同阶层的农民来说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境遇。

4. 不确定的政治诉求。底层农民的政治诉求以生存为前提，不一定有身份认同的自觉；占有权力资源的农民则能够根据国家或上层的制度性安排而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选择。因此，政治诉求不一定是农民集体行动事前的明确主张和利益要求，但很有可能最终表现为动摇现有社会结构或政治结构的结果。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农民的抗争往往并不是由农民（阶级）独立完成，特别是在革命语境中讨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正如《农民的权力与抗争》编者所强调的，要全面理解农民，就必须要知道农民与其他哪个阶级联合；要理解农民的抗争，就要知道农民的抗争是怎么样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抗争。

（二）何为抗争

在农民抗争这一议题中，“抗争”既包括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由经济上的不满（阶级剥削）所引起的抗议和集体行动，也包括了传统社会心理学所主张的由非理性因素引发的恐慌、骚乱和集体暴力，还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查尔斯·蒂利等人所主张的以民主转型为背景的“抗争性政治”的抗争。农民抗争表现为抗议、反叛、革命（反革命）等被视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形式，是反对当前制度安排的群体性行为。

阶级斗争

将抗争（contention）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fight），最经典的视角莫过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农民的反抗行为以对立阶级的存在为

前提，建立在经济（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革命行为。“集体暴力——食物或税收骚乱、社会盗匪活动、起义——被诠释成为社会压力的表现，这种社会压力因剥削性的经济系统和在地主、收税人与农民之间造成的斗争而产生。”^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农民不能独立完成这一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在经典研究中，这一理论往往集中在与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相关论题上，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②、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③。

但很显然，在佩奇的《农业革命》^④、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麦克斯的《华南农村革命》^⑤中，阶级理论被创造性地得到运用。他们的研究，更强调的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而非阶级意识，强调阶级关系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阶级利益而非阶级觉悟、组织而非政治共同体，以及一直存在的大市场和商业化。在这里不能不提出的疑问是，如果不强调阶级意识，农民抗争是否能被理解为阶级斗争？这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农民问题上阶级斗争论的解释值得进一步探讨。

集体行动

赵鼎新曾经区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个概念。^⑥通过三个维度，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他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区分。但就农民抗争的研究而言，这种分类的意义并不十分显著，因为农民很少像现代的社会运动那样主动地依据合法性原则追求社会变革，从而无法使得三种政治行为具有分析概念的价值。在集体

① 李丹：《理解中国农民：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胜波、张洪云、张天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174页。

②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国家起源》，拓夫、张东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③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④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Free Press 1975.

⑤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1984.

⑥ “所谓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就是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revolution），则是由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行动的理论视角下,农民抗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类型,不如说是由于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集体心理和结构性紧张而产生的“非理性”群体反抗行为。

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并进而形成研究视角和理论传统肇端于勒庞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随后被斯梅尔塞、布鲁默等人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社会心理学成为研究集体行动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它把情感、信念、大众文化和社会结构视为解释反抗行为的重要因素,重视从个人心理状态到群体行为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同时对于个体行动者来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的探讨,关注集体意识形成,并假设,它是反抗行为得以发生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集体行动作为抗争研究的视角,其显著特征在于对社会结构与情感性因素相关联的强调。蒂利对17世纪法国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都解释了集体行动作为抗争表达的行为逻辑。研究者们注意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或者相对剥夺感促发了集体行动。在松散或组织化程度不高(米格代尔)的乡村社会,农民的平衡感一旦遭到破坏(斯科特),而发生以情感因素为核心展开的群体性抗争行为,便很难用阶级斗争或政治目的理性来解读。

农民的日常反抗(斯科特,蒂利)往往无法诉诸理性和组织化。还可以看到,在道义经济理论中,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受到挑战从而引发反抗行为的分析视角也是社会心理学的。对抗争,尤其对农民抗争的研究,集体行动的探讨不可或缺。赵鼎新对不同社会结构情境下情感因素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影响所提出的几个假设颇具启发意义。^①

抗争政治

无论是用阶级斗争还是用集体行动来探讨农民抗争,国家都不是关键

^① 他提出的几个命题是:(1)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2)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往往会受情感主导,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社会运动的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主导;(3)在威权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更有可能受情感的主导,而在民主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则主要由社会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4)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将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角色；但在“找回国家”^①的背景之下，“国家”不再只是被反对或建构的政治组织，而是政治机会结构，是抗争行为的核心影响因素，因此，民众抗争行动实际上进一步演化为抗争政治。裴宜理曾强调这一研究视角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抗争研究的重要性。

对于抗争政治这一理论，蒂利曾以若干著作的篇幅来阐释。^②“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面介入其中。”^③在蒂利与麦克亚当较早合作的论文中则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抗争政治的三个要素：（1）一些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的互动；（2）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诉求；（3）其中政府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者第三方。^④亦即，抗争政治同时具备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使它区别于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囊括了以往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国家在抗争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的强弱、行动能力、官僚化水平、权威性和可利用资源影响抗争的形成和发展。

具体而言，蒂利强调各种抗争行为或社会运动的政治命题以及它们作为民主制度过程的意义。^⑤在这个过程中，蒂利认为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1）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它是动员的基础；（2）国家的作用。^⑥这也是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蒂利和麦克亚当发展的政治过程模型，除了强调（1）动员网络以外，还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以下要素：（2）政治机会结构，比如国家的压制能力，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3）抗议台本，即一套动员策略；（4）集

① 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 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蒂利、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③ 蒂利、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9页。

④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⑤ 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